

简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及教学

付海鸿

内容提要：从“识字”与“写史”运动来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及其教学，一方面体现了新中国民族平等的国策，以达到民族团结的愿景；另一方面在知识谱系的层面力图还原民族文学应有的价值与地位，进而实现整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教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例，其成立、教学及科研都旨在实现上述学术目标。然而，当下情状与实现整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教学初衷仍有差距。如何从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二分的教学走向中国多民族文学教学，应成为当下学界共同致力之事。

关键词：文学教育 民族平等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学界对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抗金英雄”的讨论，曾引出社会各界对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评介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热议。^①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关文学作品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尴尬处境。这些争论实际上隐含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与表述历史中的民族关系；二是对文学作品在民族团结教育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这一事件提醒学者与教育界同仁必须正视“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②之现实情境。同时，这亦是认知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历史”与“教育”的首要前提。

如果忽略现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现实基础，忽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多历史”与“多文学”^③的特性，学界所努力朝向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④将成为空中楼阁，而试图通过文学教育及其他文艺形式促进民族团结的愿望亦将陷入重重困境。因

① 刘万永：《岳飞历来是民族英雄 高中历史教材从未重新定位》，《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0日。

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2009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③ 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石一宁：《呼唤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民族文学》2009年第11期。

此,我们亟须回到中国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当下情状,立足现实,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及其教学。在此基础之上,努力回向真正的多民族中国的文学教育。

“识字”与“写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及教育的创建

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①,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展开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的运动。如自1950年起中央民族访问团前赴西南、西北、中南、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主席对首先出发的西南访问团作了指示:“你们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好的访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邀请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开会及参观。这些双向的活动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③。正是在此共建新中国并努力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民族识别、民间文学的搜集、抢救与整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调查等随之展开。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构建及其教学而言,上述语境可谓当时有益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此语境中,有两条平行却又相互交叉关联的线索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构建的过程。

(一)识字运动、少数民族干部培训与语文系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专业的起点,梁庭望认为应是1952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成立。语文系当时的重要任务是作为主力参与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进。^④梳理中央民族学院的成立与语文系的建立过程,就能理解民族文字创制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成立之间的关系。

为何要发展民族院校?前面已经提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采用了多种方式积极实践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院校是多种践行之一。1949年11月,因青海省委多次反映马步芳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影响民族团结,毛泽东电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

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见金炳镐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②降边嘉措:《民族大团结从此开始:记毛主席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题词的经过》,《民族团结》2000年第6期。

③周恩来:《一九五一年的政治报告》,见白静源编《周恩来同志对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15页。

④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①

由上引文可知,设立民族学院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形塑少数民族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崭新形象;二是以少数民族干部为桥梁,增进党中央与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争取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以达到民族教育与民族团结的目的。此后,周恩来总理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中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②。紧接着,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方案强调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是“为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③。于是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等民族院校成立。

为何开设语文系?民族院校成立后即涉及到具体系科的设置等问题。《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指出,应先行设立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及两个系,即本科政治系与语文系。政治系计划以两年的时间培养各民族的革命骨干。语文系主要招收高中毕业以上的志愿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学生以及有相当学历的少数民族学生,专修各少数民族语文,两年毕业。^④如果说政治系的设立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语文系则看重语文教育对国家形塑、民族团结的重大影响。

语文系设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语文专业的教育。在全国规模的民族识别运动以实现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大背景下,1954年政务院责成中央民院负责训练语文干部以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文字,语文系学生培养目标遂改为民族语文工作人员、翻译和教学人员。^⑤荣仕星在《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中指出:“为尽快培养教授民族语文,改进或创制民族文字,参加语言调查,从事翻译工作所急需的教学、科研、翻译人才,

① 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电报》(1949年11月14日),转引自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419页。

② 周恩来:《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1950年6月26日),同上,第425页。

③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1950年11月24日),同上,第441~442页。

④ 《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0年11月24日),同上,第443~444页。

⑤ 马学良:《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学的情况和经验》(1955),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编《民族语文专业教学经验文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

语文系在1951-1966年间先后开设过24个语言专业。当时语文系各专业虽以语言文字为主,但也教授民族文学和文献”,他认为这些专业“是文学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这一学科门类的起点”^①。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创制民族院校的语文系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语文系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设、少数民族识字率的提高与普及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等,增强了各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由此,国家、民族、文学与教育四者在此紧密关联,这是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构建及其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2.“写史运动”、民族平等与文化繁荣

与“识字运动”几乎平行展开的是编写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写史运动”)。“写史运动”历时颇长,可谓从1950年代末延续至今。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会上指出“目前社会上迫切需要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就写“史”或写“概况”的原则作了说明,指出其应“强调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②,这与当时社会上的迫切需求有关。1960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集了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会上确定“争取在一九六一年‘七一’以前写出大部分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初稿,作为向党的四十周年的生日献礼”^③。把民族文学史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党,其实是在践行并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④的倡导。为何选择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作为“献礼”呢?笔者以为,“献礼”的意义有二:一是展现各少数民族文艺的繁荣发展与自信果敢;二是表达各民族对新中国的赤子之情。简言之,以各民族文学史作为“献礼”强调的是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下,中国各民族文学焕然一新、竞相绽放、蓬勃生长之势。

回头再看“写史”运动。何其芳于1961年4月17日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的发言。在前言部分,何其芳从两个方面说明了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意义所在:一是于中国文学和学术的意义,二是政治意义。关于前者,何其芳认为“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

① 荣仕星:《中央民族大学五十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1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4年,第1-2页。

③ 《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同上,第5页。

④ 降边嘉措:《民族大团结从此开始:记毛主席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题词的经过》,《民族团结》2000年第6期。

况的。”^①关于文学史的“名实之争”，张寿康于 1951 年在《论研究少数民族文艺的方向》一文中亦有讨论。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汉文的文学，这是全中华的文学”，“我们的新文学史中，是不是应当有‘中国各民族的文学’这一部分呢？”^②也就是说，“写史运动”所致力的并不是将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剥离脱落，而是要将其廊括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史书写中。关于政治意义，何其芳强调此举能增进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也就是说，从国家建构的现实层面而言，为少数民族文学写史一方面能体现民族平等的政策，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无独有偶，贾芝在《祝贺各兄弟民族文学史的诞生》中亦强调民族文学史在体现民族政策与国家宪法方面的政治意义。^③郝时远则点明“为每一种语言写志，为每一个民族修史，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体现”^④。

尽管“写史运动”主体上体现为一种国家行为，但张寿康、何其芳等学者的学术倡导与关怀指向，以及诸多学人的积极参与，可谓功不可没。时隔多年，学者如何评价“写史运动”的呢？针对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同质性问题”，即 50 年代确立的基本写作架构在 80、90 年代仍然得到肯定和坚持，吕微从民族文学史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的角度指出，“民族文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可以满足学术性和民族性的诉求，其背景却是保证国家和政治基本原则的考虑”，“看似一个各种要求相互承认的结果，以此达成国家统一、民族自觉和学术繁荣的并行不悖，然而却是一个由执政者主动提出的以保证国家利益优先的预警措施。”^⑤姚新勇在《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一文中，从 1950 年代的“民族情况普查”反思大规模民族普查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诞生之关系。他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一开始就不是直接、自觉的行为，而是依附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建构行为中的，是集合性、整体性少数民族建构工作的衍生物与副产品”^⑥。二位学者实际都在强调当回溯“识字运动”与“写史运动”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与教学的重要性之时，必须正视新中国国家建构行为与民族政策在其中的巨大作用与深刻影响。

反观今日多民族中国的文学教育，中国高校内外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分的表面框架，实际上是大部分高校缺省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虚假存

① 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61 年第 5 期。

② 张寿康主编《少数民族文艺论集》，北京：北京建业书局，1951 年，第 2~3 页。

③ 贾芝：《祝贺各兄弟民族文学史的诞生》，原载《文艺报》1960 年 8 月号。另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参考资料》，第 88~93 页。

④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91 页。

⑤ 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⑥ 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性”建构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

在。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说法,看似将中国文学二分切割、力量均衡,实际在具体教学中这种二分也并未真正实现。这与“识字运动”与“写史运动”想要促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教学的最初学术目标相距甚远,无法体现民族政策中的民族平等,亦有悖于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二分”与“三所”

2010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曾发起“如何在综合性高校推进中国多民族文学教学”的讨论。在笔者看来,其讨论的意义在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①这一现实国情的正视,并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指导与反思中国高校文学教育现状。如关纪新从中国自古而今的民族和文化多元并存与彼此互动的历史维度、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历史与现状的全球维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政体等角度指出,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教学中,应普遍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文化/文学的课程。^②遗憾的是,大多数就高校文学教育现实情状的讨论,主要偏向于教学观念、教学建议、教学经验的分享^③,对中国多民族文学教育之构成现状的整体审思仍有欠缺。

笔者以为,在探讨中国多民族文学教学构成的现实情境时,或可将作为研究机构的文学研究所与作为教学机构的文学系所等为基点,将其放置在原初的社会语境中加以理解。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现有三个文学研究所机构: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即1980年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今日,这三个机构的并存被视作常识。若稍作追问,就会发现其并非天然如此。

张炯在回顾新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的时候,曾细述文学研究所之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专院校的调整,1953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了以郑振铎先生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1956年这个研究所被纳入中国科学院,1978年又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于1964年将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分出来另立外国文学研究所,1980年又将民族文学研究部分独立出来另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④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白皮书,1999年9月),第95页。

② 关纪新:《综合性高等院校应普遍开设民族理论及多民族文学课程》,《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6期。

③ 吴刚:《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8429。

④ 张炯:《文学科学:大踏步前进——对新中国五十年文学研究的回顾》,见《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88页。

细加思考,就会见出:在民族文学研究所未独立出来之前,“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有一未被提及而实际存在的对应物,即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在此机构中,民族文学研究亦有一对应物,此对应物即现在的文学研究所。如此来看,这里隐含有两组关系:一是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二是民族文学研究与汉语言文学研究。第一组关系主要以国别作为区分的标准。“外国文学”指中国之外的国家之文学,而“中国文学,是包括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总汇”^①。第二组关系则以民族为区分单位。“民族文学”即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和一些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②。汉语言文学指的是什么呢?“抛开各族文学的所谓中国文学是不完全的,或者是汉族文学”^③。两组关系的划分标准不一,前者涉及国别,后者包括民族。要理解今日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三所并存的原因所在,恐需要对何以有这种国别、民族混杂划分再作追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三十年际,其院报刊出了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始末》^④一文,或可为此提供些参考。该文提到,1979 年初,贾芝、毛星、马寅、马学良、王平凡等五人起草了一份《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其主要内容有:

从发展文学事业的方面看,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以及文艺理论遗产,可以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能够增强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尊,增强民族凝聚力。^⑤

上引文强调了其请示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最初目的:一是文学事业发展的意义;二是民族团结与民族凝聚的政治意义。

反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立,也就能深切同情当它独立出来与中国文学研究所并

① 和钟华、杨世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纳西族文学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

② 中国民族文学网“民族文学研究所简介”,<http://iel.cass.cn/top.asp?channelid=5>。

③ 马学良:《素园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

④ 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 3 月 20 日。

⑤ 转引自刘大先《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始末》。

置的时候,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这种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二分,使得文学教学系所与研究机构存在国别之分、民族之论、国别民族混杂的情况。以至在中国文学阵营教学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边是不包括汉语言文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边是不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所谓的中国文学。如民族高等院校一般都设置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和“文学与新闻学院”。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作为一个机构的存在,赋予民族文学以某种正统官方性与立足点,为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从成立之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以来,它将以往主流文学叙事中所提甚少的民族文学真正纳入文学研究、教育机构的视野,同时也为多民族中国如何在知识谱系的层面还原民族文学应有的价值与地位提供了一个路径,其意义不可估量。

相关“民族文学”称谓的反思,反映在文学研究机构与教学中,不能忽视“汉”与“非汉”二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邓敏文针对“民族文学”这个词语通常用来称谓“除汉族以外的中国所有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文学”这一现实,指出“这是一个并非确切和并非科学的习惯用语,汉族文学也是一种民族文学,是汉民族的文学”^①。这样的警醒,并没有否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强调与重视,相反,是要唤醒对其予以最基本与最真诚的尊重。“正名”的目的,实则是对中国文学中各民族文学之具体关系问题的追问。

如此,在新中国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梳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及其教育的构建过程,同时回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三所的并存,就能理解这其实是多民族中国在文学教育与研究中对民族平等政策的一种践行。因而,如何突破中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分的教育情状,展现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学与文化,尽量减少或避免偏见与分歧,的确是当下刻不容缓之事。

余 论

在现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教育中若过度强调“汉”与“非汉”的二元对立,将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稳定,也与最初创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目的背道而驰。但多民族中国的文学教育若仅只聚焦于“文学的审美鉴赏”与“知识的传授”,以汉语言文学替代整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②的现实基础,亦不可取。

2010年,学界提出“如何在综合性高校推行多民族文学教学”的讨论,实非简单的倡导

① 邓敏文:《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费孝通:《代序 民族研究》,见费孝通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与号召,亦非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与教学”积极意义的否定,而是对当下情状的警醒与反思。因而,回溯与反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及其教学之后,学界同仁如何突破以往“汉”与“非汉”、主流与边缘、书面与口传等多重的二元对立格局,在平等、开放的整体结构中展开多民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②为理论指导,把握与讲授中国多民族文学,迫在眉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04)阶段性成果。

(付海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参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开题报告之十五“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批准号:11ZD&10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506/219507/16982276.html>。

② 2007 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发起“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相关文章可参考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